

非洲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反思： 阿明的依附论*

姚桂梅

内容提要 萨米尔·阿明的依附论对非洲国家如何选择发展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代表着一种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挑战和替代方案，其理论目标在于探索造成欠发达国家发展困境的原因和寻找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有效路径。依附论在思想渊源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它借助于结构主义发展学的“中心-外围”模式，提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导致欠发达国家对外依附的基本假设，主张走与世界体系“脱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的时代，阿明的依附论因过于强调外因作用的单向理论图式难以适应非洲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其致命的局限性使其在主流学术舞台日渐式微，但是其理论本身和曾经有过的重要影响都给非洲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留下了反思空间。

关键词 非洲发展道路 依附论 萨米尔·阿明 “中心-外围”结构

作者简介 姚桂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非洲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成功解决的问题。尽管自从独立以来非洲国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但各种尝试并没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非洲至今仍未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的状况。究其根本原因，非洲国家始终未找到一条适合非洲实情的发展道路。尤其是非洲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制定发展

* 本研究成果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项目资助。

政策等方面，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思想的支撑。作为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联的依附论，曾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它终因脱离非洲实际，未能使非洲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虽说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非洲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但在探索非洲发展道路上仍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因此，未来非洲国家应如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深入的现实研究和探索，还需要对各种理论进行反思，正本清源。

阿明依附论的主要思想内涵

20 世纪 60 年代末，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和局限性。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寻找新的理论突破。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批判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关系入手，寻求导致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如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独特道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发展理论——“依附论”。从依附论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它是一批分散于各地、基本观点相似的学术代表对欠发达国家依附问题进行诠释并探讨对策的多种理论的总称。其基本观点和基本概念的相似性表现在：都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持批评态度，都使用“中心”、“外围”和“依附”这几个基本概念来描绘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仅从社会内部分析欠发达国家的落后，主张应从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和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中去诠释后者欠发达的原因；认为发达和欠发达是经济剩余转移过程的两个不同结果，“中心”的发达导致了“外围”的欠发达；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推崇的发展模式，指出西方化过程正是欠发达国家被纳入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西方化和依附化相辅相成。^①

由于依附论是一个理论集群，学派较为松散，因而在分析方法、强调程度和政策意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彼此分歧很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依附论分为多种流派。当前，多数学者将依附论分为正统依附论、改良依附论、激进依附论 3 个流派。德裔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埃及的萨米尔·阿明

^① 张秀霞：《依附论发展的再思考》，载《社科纵横》2012 年第 8 期，第 56～57 页。

是激进学派的主要代表。尤其是非洲本土学者萨米尔·阿明的理论主张对非洲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阿米尔·阿明, 1931年9月4日生于埃及首都开罗。1952年及1956年先后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百丽大学统计学研究所。195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马里政府计划经济及顾问、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 也曾在法国的普瓦蒂埃大学和巴黎大学、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教书, 著述颇丰, 阿明的依附论主要有以下重要观点:

(一) “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使“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

《世界规模的积累》是阿明依附论的奠基之作。在此书中, 阿明对“依附论”进行了精心构建和系统阐述。他通过对李嘉图以来的各种经济理论的扬弃, 并把“外围”的剩余价值外流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相结合, 为其“依附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① 阿明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是由“中心”和“外围”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所构成的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 发达国家是“中心”, 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由“出口部门”、“群众消费部门”、“奢侈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4个部门构成。“中心”进行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由“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构成, 进行的是“自主中心积累”, 具有自身动力; 而“外围”进行的主要是由“出口部门”和“奢侈消费部门”构成、具有明显“外向积累”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因此, “外围”必然依附于“中心”。这是因为: 第一, “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从外部引进的, 是“中心”国家通过殖民统治强加给“外围”国家的, 这导致“外围”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畸形发展, 不可能朝真正成熟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 只能形成受外国垄断资本支配的“封建领土”和“买办资产阶级”, 以及为外国垄断资本直接或间接服务的行政机构。它决定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统治着它们的‘中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积累规模所支配”。第二, 世界范围的积累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原因, 而不平等交换是“外围”依附于“中心”的基础。“中心”国家为追求高额利润和阻止利润率

^①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 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世界规模的积累》,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第463页。

的下降向“外围”输出资本。“外围”国家吸收资本后，囿于国内狭小的市场规模，只好发展原料生产，迎合国际市场需求。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生产率的低下，与高生产率的“中心”国家相比，“外围”国家总是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结果，世界范围的积累虽然缓和了“中心”国家由于国内利润率下降而引起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加快了资本的繁衍，但同时也诱发了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并且财富日益向“中心”集聚，“外围”国家愈发贫穷。第三，国内市场侧重于满足奢侈消费品需求，是“外围”难于摆脱依附“中心”的重要内部原因。阿明认为，一旦出口部门扩张到一定的规模，国内市场开始形成。但与“中心”相比，“外围”国家的国内市场相对地不偏好“群众”消费品而侧重于“奢侈”品的需求。这就决定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缺乏自身动力，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① 总之，对世界规模的积累的分析表明，这种积累总是对中心有利：不是“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提供资本，而是相反。这就说明了后者的“阻滞”，说明了“欠发达的发展”。由此可见，外围国家只有走出世界市场，发展才有可能。^②

（二）提出“脱钩”发展战略，倡导社会主义

阿明在《自力更生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文中指出，“外围”国家的发展要经历殖民主义、替代进口工业化、“外围”真正自力更生这样3个历史发展阶段。阿明指出，第一阶段是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告终。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往往是从发展耐用消费品开始，而群众消费品的生产有意地被延迟。这种工业化结构不仅使群众日益贫困，而且使少数特权阶层的财富急剧增加，更加偏好“欧洲式”的消费方式。它必然导致“外围”国家的再生产永远缺乏自身动力，而助长外部动力持久不衰。与此同时，“外围”国家要发展耐用消费品，就需要“中心”对其进行密集型的资本投资和技术支持，从而加剧了对“中心”的依附，不可能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阿明指出，在第二阶段“外围”资产阶级因采取替代进口的工业化而改变了其与垄断资本之间关系的性质，从而失去了其第一阶段、即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性”特征，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① 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第76页。

② [埃及]萨米尔·阿明著；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前引书，第83页。

走向“买办化”。因此，第二阶段仍是第一阶段的“延续”。为此，阿明主张，“外围”国家的出路在于断绝与“中心”国家的经济联系，才能改变和摆脱“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困境，走向真正的自力更生。阿明在《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一书中指出，“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导致冲突，而令人考虑到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①。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前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为此，阿明指出了“外围”摆脱依附，走向社会主义的“脱钩”战略。具体路径涉及3个层面的内容：选择以本国资源为基础的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优先考虑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增强集体自力更生能力；努力提高原材料价格，控制自然资源，确保第三世界国家的制成品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并加快技术转让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②

阿明由此得出结论，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心”垄断资本联合“外围”地区的官僚买办阶级，压迫和剥削“外围”地区的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从而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决定了“外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发生。其目标不仅是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是经济上的解放。其主要敌人不仅是国际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其归宿在正常情况下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阿明还断言，社会主义革命是从资本主义的“外围”开始的；“外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在此背景下，阿明指出，“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遵循以下五项原则：第一，必须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朝着对农民有利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旨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工业化；第三，要使收入相对平均，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扩大再生产；第四，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结合起来，以减少开支；第五，尽最大可能在政治经济上对外部世界保持独立自主地位，既不排外也不媚外。^③

①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高钰译：《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

② [埃及] 萨米尔·阿明：《自力更生与国际经济新秩序》，载《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3期，第69页。

③ 唐宝才：《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来华访问和讲学》，载《西亚非洲》1981年第2期，第77页。

（三）关于非洲的不发达问题的论述

阿明是非洲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他根据“依附论”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指出，非洲经济灾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非洲国家大多属于“外围”国家，他们从19世纪起就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范围。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延续着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老路，依靠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生产国际市场所需的农矿初级产品。这种单一的、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不可能使非洲国家摆脱对外界的依附，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他断言，还处于依附地位的非洲国家不会出现一种成熟、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即使某些国家建立了某种“国家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改变了形式的“殖民依附”关系；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所增长，实现了“工业化”，也只是“有增长无发展”的典型，在这方面产油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① 因为这种发展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附，离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越来越远。实际上，这种工业化把从中牟取利润的本地资产阶级和提供先进技术及资金的外国人结合起来，而这些外国资本家给本地资产阶级提供了西方的消费模式和西方文化“代用品”的翻版。因此，非洲“外围”国家战后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依附，使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一直被我们称作第四世界的非洲，被指定在资本世界化的新阶段上被边缘化。再如《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文中指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10%的非洲地区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有一半的非洲人生活在赤贫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若设想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改变这种状态成了无稽之谈”。^② 要解释整个非洲的失败，需要分析内部特殊环境和世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之间所有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应考虑殖民的责任和由领导阶层与新殖民主义联合执政的殖民方案的延续的责任，并且要关注帝国主义的全球地理战略。^③ 尤其是非洲领导层应在谁导致非洲大陆经济衰退的问题上负起自己的责任，当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列身于新殖民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们也由此造就了非洲的脆弱。

① [埃及] 萨米尔·阿明：《非洲沦为第四世界的根源》，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2期，第29页。

② “John J. Saul and Colin Leys, Sub-Saharan Africa in Glob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ume 51, Issue 3, 1999, see <http://monthlyreview.org/1999/07/01/sub-saharan-africa-in-global-capitalism>, 2014-09-20.

③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任友谅等译：《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作为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结构调整只能使非洲退化至贫困化和更严重的边缘化。社会交替仍然存在，尽管实现交替条件的过程是困难的，关键是在非洲国家的层面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的民族阵线，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一个多极世界，以便减轻受压迫的状态。^①

依附论对非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阿明的依附论对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渴望得到真正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很有吸引力，因而在不少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阿明对非洲经济发展开出的加强国家干预、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等药方，与“非资本主义道路”思想在很多方面异曲同工，产生的影响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非洲国家不成功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日益对立，非洲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大阵营激烈争夺的对象。苏联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争夺非洲，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试图以此将非洲国家作为同盟军拉入社会主义阵营；阿明的依附论则指出“不发达国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完善产业结构，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过渡，才能彻底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走上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以上两大理论殊途同归的主张，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向往当时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烈向往高度契合，结果有近半数的非洲国家先后公开而明确的宣称奉行社会主义。^②尽管非洲社会主义形式多样，流派纷繁，但发展模式多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共同特征。从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在某些部门和领域取得一些成就，但总体而言，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实现达到高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预期目标，也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改变了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普遍提高。对比非洲国家独立后50多年的经济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当初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非洲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没有走

^①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任友谅等译：《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② 唐大盾等著：《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资本主义道路的非洲国家快，甚至有的国家还比实行社会主义之前还要倒退，更加贫穷。由于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超越自身生产力水平，缺乏客观的物质基础，加上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最终没有获得成功。

（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非洲经济的内向化与边缘化

众所周知，非洲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后，有着十分强烈的经济独立的发展愿望。非洲国家为保护民族经济的发展、摆脱外国资本的剥削与控制、减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大多采取了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渊源不仅有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示范效应，也离不开阿明依附论的理论诱导。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要措施包括实行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尤其是货币高估政策和复合汇率制度，客观上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实践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在非洲并没有得到成功可行的验证。因为该战略是一种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内向型的发展战略。而非洲国家不仅经济落后，居民购买力低，而且国内市场狭小且极易饱和，导致该战略缺失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实行进口替代的非洲国家大都实行国有化和限制外资等保护性政策，导致许多企业逐渐丧失市场竞争意识，盲目追求“保护利益”，从而阻碍新技术的推广、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影响企业的应变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缺乏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保护政策实际上使非洲国家处于封闭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阻隔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有机联系。这既不利于国内外经济技术的交流，也不利于外资的引进与利用。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非洲经济逐渐滑向世界的边缘。同时，进口替代的初衷是为了节约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但实际上随着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非洲国家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原料和零配件的进口大幅度增加，产品出口却由于缺乏竞争力，销售渠道不畅而份额逐渐萎缩，最终导致非洲国家的国际收支日趋恶化。总之，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先进技术不易推广，生产成本难以降低，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最终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失去活力，进口替代最后成了保护落后的代名词。

（三）激进的地区一体化战略

非洲地区的一体化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首推具有鲜明的“非洲一体性”特征的泛非主义。在泛非主义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地区一体化蓬勃发展阶段。1973年第十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自力更

生”的方针。在该宣言的鼓舞下，非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多，非洲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大多是该时段成立的。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非洲地区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阿明依附论的推动。以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激进学派，主张以自力更生和集体自力更生来发展本国及非洲大陆的经济理论在非洲国家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论据。阿明的观点在非洲首个自己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拉各斯行动计划》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拉各斯行动计划》不仅提出了消除贫困和普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多样化来增加生产，实现长期持续发展，促进非洲单个国家和非洲大陆集体自力更生的3项中心任务，还规定了到2000年实现全非经济一体化的远景目标。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地区合作组织已经达到200多个。目前，除少数解体与合并、个别不大起作用外，大多数组织都为非洲经济发展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但是，由于《拉各斯行动计划》的理论支撑是外因决定论的依附论，导致非洲国家将非洲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主要归结于不利的外部条件，虽然非洲国家也承认政策失误和结构性缺陷，但仍认为外部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继续奉行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一脉相承的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二者都倾向于内向的发展，只是把内向空间由单个国家扩大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单纯追求工业化变为全面探索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由于对非洲经济发展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估计不足，对改变畸形经济结构看得过于简单；由于设定的规模过于庞大、目标过高且脱离实际，《拉各斯行动计划》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后被1991年6月出台的《阿布贾条约》取代。

世纪之交，非洲国家领导人对非洲在全球化趋势下不断被边缘化的地位进行了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全面反思。非洲国家认识到，《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失败，就是过于强调非洲内部的力量，过于排斥国际市场的作用，内向式的发展道路无助于非洲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合作固然很重要，但这种区域性经济合作因受互补性差的制约根本无法取代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应注意非洲地区发展应与全球发展相协调。于是，2001年，非盟出台了自主发展与国际协调并重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以地区一体化组织为实施依托，在立足自主发展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配合，为未来非洲经济振兴带来希望。

对阿明依附论的历史评价

阿明作为全球化和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上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显著的地位。其依附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非洲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提出的“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模式，分析了世界范围内价值转移的运行机制，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乃至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对非洲国家进行压榨和剥削的实质，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问题提出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办法，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依附论”最大的理论成就，也为研究非洲不发达状态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从价值取向上看，依附论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为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同时，阿明在分析非洲不发达生产时，关于非洲国家国内市场相对侧重奢侈品的需求而不偏好大众消费品需要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非洲生产与消费结构的特点，及其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阿明认为非洲国家市场狭小，应加强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开展集体自力更生的主张，为非洲国家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阿明关于重视农业、收入分配应平等合理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更接近于非洲现实，对非洲经济发展更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但是，阿明过于简单的研究方法导致其对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新因素和新发展的认识、对第三世界国家力求减少依附性和增强自主性的估计、对第三世界发展进程和发展道路的设想，在许多方面都有失偏颇，难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而且他据此提出的过激的经济政策又脱离了非洲国家的实际，引起了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反感，最终使其理论难以广为传播和付诸实践。尤其是他将其研究重点放在外部因素上，割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由此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

第一，阿明的依附论对非洲经济发展采取了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阿明从历史的联系中探讨了“中心”与“外围”的相互关系，这是必要的。但是，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根本特点是，尽管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还在，但非洲国家已经不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在这种情况下,将这继续作为前提条件,并据此分析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当然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其实,非洲国家独立后,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不断深入并赋予了新的含义,“依附”正在转向相互依存。生产的全球化已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利用发达国家市场、资本和技术的机会,同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非洲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依存度与日俱增。发达国家越发认识到,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同样离不开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市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发达国家经济安全运行提供了获益的保证。因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削减债务、筹措资金、保护环境、进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也不能完全不要考虑发达国家的权益,以此营造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潜在的外部经济环境。非洲国家在依附行为中,已经变被动依附为主动依存,增强了依附选择中的相对自由。有选择地接受发达国家所转移下来的相对较高层次的产业的的同时,实现本国的产业挑战和升级,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依附论中所说的无原则、无限度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只有把依存与发展真正做到有机的结合,才能走上从边缘向核心的转移的发展道路。

第二,阿明的依附论过于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忽视了内部因素的多样化。阿明采用单因论的理论论证逻辑,将“中心”、“外围”凝固化,得出“中心”永远是“中心”,“外围”永远是“外围”的结论。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宿命论的味道。这导致他看不到非洲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看不到非洲地区与国别间的差异发展,甚至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认为只是“依附”的加强。阿明这种缺乏主动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忽视非洲可能与外界存在和谐与相互依存发展的悲观论调,导致他不可能为非洲发展找到一条走出不发达的正确途径。

阿明认为,非洲国家的生产主要是满足“中心”的需要,因而缺乏自身的内部推动力。尤其是,他认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当地资产阶级,也只是外国垄断的附庸。他们满足于奢侈品的消费,或者将攫取的财富转移到国外,很少在国内投资,发展生产。这些论述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是片面的。非洲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事实。但是,其一,随着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内的需求也有长足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内部需求的拉动,所以,阿明说非洲国家没有“内部推动力”显然已与事实相左。其二,非洲国家的出口可以

增加外汇收入，外汇收入的增加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的资金需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出口也可以转为经济增长的“内部推动力”。其三，由于诸多原因，非洲国家内部推动力处于潜伏状态，但一旦变为事实，其能量足以使非洲国家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因此，理论家的职责不应只是描述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要揭示未来，在这个意义上，阿明的悲观主义态度无助于非洲国家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只能使非洲陷入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困境。阿明由此提出了与现存国际体系“脱钩”的主张，这既不可能，也无助于非洲国家摆脱贫困和依附的状态。反而将非洲国家引向闭关锁国的内向式发展道路，加剧了非洲经济困难程度。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谁利用国际市场，谁就发展得快，谁排斥国际市场，谁就发展得慢，甚至落后和倒退。非洲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实行了内向化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使非洲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阿明提出的加强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因受同质性高而互补性差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取代与外部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对于非洲国家来说，集体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以克服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短缺的困难。只有这样，非洲国家才能利用国内外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其经济发展。因此，阿明的“脱钩”理论对非洲国家来说弊大于利。

其三，阿明的依附论对非洲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错误分析，将其作为革命对象。阿明在分析非洲国家内部阶级关系时认为新兴资产阶级已经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失去了其民族性特点而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由此他认为，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必须消灭之。显然，该论点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非洲现阶段阶级关系变动的错误分析运用到世界范围，认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中心”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心”的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格局中，上面提到的“外围”民族资产阶级将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改造世界的基本动力，甚至成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外围”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凶。这个观点更为荒谬。这说明阿明在考察“中心”与“外围”国家

的关系时，发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整体上工人阶级的受剥削地位始终未变，仍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正是这一系列的错误分析和结论，导致阿明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外围”，非洲国家的任务是与发达国家“脱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心愿，但其盲目鼓吹社会主义革命，脱离非洲国家实际，最终陷入了唯意志论，将非洲经济引入歧途。

结 语

当前，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上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之一。阿明的依附论曾在非洲国家选择发展道路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实践效果差强人意，但它启迪了后人，引起了人们对于非洲发展问题的充分关注。尤其是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依附论，必须赋予它新的思考。第一，依附论要想重新回归主流学术的舞台，继续成为具有超强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就必须跟上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步伐，关注非洲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排斥与相容，进行更加宽容且多元的理论创新。第二，非洲国家应正视非洲依附的事实存在，充分发挥政府强有力的作用，发挥优势，把握国际事态，在依附中实现发展。第三，应该动态看待非洲发展的地位与作用。依附论在主流学术舞台上的式微，并不能从根本上掩盖非洲的依附事实。只不过要用动态而非静态的方法去审视非洲的地位。事实上，当今的非洲与世界已经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发达国家依然掌握着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发展的主动权，但非洲国家也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与市场优势，甚至依附领域的多维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发达国家形成牵制的可能，赢得学习和发展的时间。以我为主与国际协调并重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发展战略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非洲是可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下，走出单向依赖困境的。第四，非洲大陆有54个国家，各地区和各国之间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因此需要与时俱进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即便在一个非洲国家也应根据时代的变迁，制定多维一体的发展战略，即内生发展、外向出口发展和有选择性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与时俱进的调整三者的权重比例。第五，依附论的适用性目前只体现在非洲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国际关系中，是否可以拓展到非洲大陆的国与

国之间，单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呢？这一问题值得学界争鸣探讨。因为不平衡发展一直在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亟待应对。未来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方案中，必须重视不均衡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利益纷争问题，力争做到利益共享，全面受益。

Theory and Reflection on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pendency Theory of Amin

Yao Guimei

Abstract: The dependency theory of Samir Amin has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s ov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dopted by emerging African nations. Aiming at theoretically pinpointing the origin that brings out development dilemma of undeveloped nations and finding out possible effective paths to get rid of it, the theory signifies a challenge and an alternative towards Western theories on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Ideologically, the dependency theory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Marxism, which by adopting “Core – Periphery Model” of structuralist development theory, suggests a basic assumption that the world system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ough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utward dependency of undeveloped nations, and argues that a socialist approach which “detached” from the world system should be put into practice. Within a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however, hardly could this theory find itself cover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emands of African nations due to its unidirectional emphasis on external factors, which finally leads to its decline in the arena of mainstream academia. Despite of this, the theory itself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s it has once exerted over African countries, provide a helpful reflection room for African nations to probe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paths.

Key Words: African Development Path; Dependency Theory; Samir Amin; “Core – Periphery” Structure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